

20世紀  
中國

# 荒野上的 大師

中國考古黃金時代  
Rediscover A Lost Era

張泉  
著

中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 推薦序

# 不可磨滅的足跡

---

十年前，張泉第一次訪問史語所時，我告訴他，現在的史語所無法定義。

在史學領域，陳寅恪先生那一代人代表着一個大師的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落幕。如今，史語所還能在世界漢學界佔據一席之地，靠的是每一位學人研究成績的累積，大家陸續開拓出新社會史、思想史、宗教文化史、新文化史、環境史等研究方向，走出各自的新路。從前，傅斯年先生認為史語所是一個學派，現在我們卻非常多元。

大師的時代似乎一去不返，但我很高興張泉願意探究那段逝去的時光。

2011年秋，張泉來訪問史語所。當時他是《生活》雜誌副主編，策劃過敦煌、台北故宮、營造學社等專題報道，他的許多文章都讓我印

象深刻。他希望採訪史語所的同仁，記錄幾代學人的心路歷程。那時我正擔任所長，自然全力支持。

離開台灣大約四個月後，他發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文，請史語所同仁針對歷史細節幫忙勘誤。看得出，他下了很深的功夫，用豐富的史料展現出史語所從創建到遷台以來的變遷。他的視角獨特，從那一代人構築民族想像與重建公共信仰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史語所的使命、探索與貢獻。他尊重歷史，持論公允，又能以動人的文字娓娓道來。我和幾位同仁讀過，無不交口稱讚。這篇報道在《生活》雜誌刊登後，我請同事又彩印了許多份，分發給所內的同仁和來訪的海內外學者，便於大家了解史語所的歷史淵源與嬗變。

2014年秋，雲南派代表團來訪，提出在昆明舉辦關於史語所的大型展覽。抗戰期間，史語所被迫南遷，曾有一年半的時間落腳於昆明。據說，舊日的所址和一些故居仍保存完好。雲南方面希望邀請專家，協力策劃這次展覽。恰巧，一個多星期後，張泉再次來採訪，到史語所與我見面。我頓時眼中一亮。策劃這次展覽，他顯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他了解史語所的淵源與現狀，並且嚴謹、細緻；而作為資深媒體人，他也擅長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把遙遠的歷史傳遞給公眾。

聽了我的提議，張泉也很興奮。後來，他多次去昆明，來台灣，勘察遺跡，查閱檔案資料，尋訪專家和歷史親歷者。他每天到傅斯年圖書館，從開門坐到下班，梳理研究一些塵封的檔案資料，或者來史語所與同仁們訪談交流。大約一年後，他完成了策展方案，格局大氣恢宏，形式生動有趣。經過我所各學門多位同仁評審建議，策展方案又幾易其稿，堪稱是對史語所歷史非常全面、深入的總結和展示，自此，雲南方面也獲得了史語所在大陸完整首展的授權，所掌握的第一手檔案資料的深度與廣度，在大陸無出其右者。

這些年我也一直在關注張泉的寫作，他對晚清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命運的追溯，對城市和地域文化變遷的探究，還有他與海內外各領域學者的訪談，都讓我感到很有價值。

如今閱讀他寄來的這部書稿，我發現，關於史語所的篇章既熟悉又陌生。他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廣泛閱讀了各種回憶錄、學術論文和專著，對學人的精神、思想與人生發掘得更深入，呈現得更完整。他還把視野擴大到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和中國營造學社，勾勒學人的群像，探究學界的浮沉。這幾家學術機構都與史語所淵源頗深，學人之間存在着複雜又密切的交集，構成一個學術共同體。無論坐擁書齋，還是走向田野，他們都以科學的精神研習「紙上之材料」，探尋「地下之材料」，在無比艱苦的環境中，有了許多震驚世人的大發現，就像張泉在書中所寫的那樣，「不世出的天才湧進同一個時代，合力造就時勢」。

讀着這部書稿，我感慨萬千，不禁想起幾十年前一個隆冬時節。當時我重返哈佛，路過「哈佛中國同學碑」時突發奇想，冒着風雪爬到馱碑的聳肩背上，一字一句辨認、抄錄起模糊的碑文。那座石碑是1936年中國哈佛同學會為慶祝母校創校三百周年捐贈的，其中有一段話，我一直難以忘懷：

深識遠見之士，知立國之本必亟以興學為先。創始也艱，自是光大而擴充之，而其文化之宏往往收效於數百年間而勿替。

當年捐贈石碑的一千多名校友中，就有張泉這本書中講到的趙元任、李濟、吳宓、梁思成、梁思永等先生，碑文則是胡適先生的手筆，並由他千里迢迢帶到波士頓。那一代學人以此碑向哈佛致敬，而他們在中國探求學問、傳播新知的歷程，同樣艱辛曲折，同樣深謀遠慮，

同樣堅忍不拔，也終於讓學術發揚光大，讓文化澤被後世，令人敬仰，也引人唏噓。

張泉的這本書，讓我們可以更清晰地回望他們走過的路。舊日的足音或已遠去，他們留在文化史上的足跡不可磨滅。

## 黃進興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史語所」原所長

# 目錄

推薦序	不可磨滅的足跡	001
前言	大發現的時代	007

## 地質調查所・書生擔斧入山

第一章	李希霍芬的「偏見」	029
第二章	先行者	040
第三章	「難稽」的洪荒	056
第四章	生死之際	075
第五章	最後的眷顧	088

## 清華國學研究院・告別烏托邦

第一章	際會	092
第二章	新思潮	108
第三章	紙上與地下	120
第四章	雲散	129
第五章	欲祭疑君在	143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重新發現中國

第一章	麥田裡的故都	146
第二章	殊途同歸	160
第三章	鑿破鴻蒙	176
第四章	關山歧路	190
第五章	抉擇	213

## 中國營造學社·被遺忘的「長征」

第一章	破譯「天書」	236
第二章	河北：萬里之行的序章	245
第三章	山西：木構的溫床	254
第四章	何處是歸程	275
第五章	李莊：沙漠中的金魚	283
第六章	尋求新「意義」	296
結語	走出書齋以後	300
參考書目		313

# 前言

## 大發現的時代

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

——王國維

### 「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魯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許並不是文學。

1927年4月8日，他到黃埔軍校演講，標題雖然叫《革命時代的文學》，入題卻是從挖煤開始的——「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sup>1</sup>

他以此自嘲，幽默地開場，但他其實沒有開玩笑。當還是個少年時，他確實曾對探尋礦藏心嚮往之，並為此下過苦功。

魯迅十八歲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到日本弘文學院留學後，依然對礦物情有獨鍾，記錄了大量筆記，手抄、臨摹過許多海外礦業的專著。他甚至下過礦井，踩在半尺深的積水裡，頭頂仍有水不斷漏下，在他周圍，礦工們「鬼一般工作着」。魯迅讀書的時代，地質學仍被稱為「地學」，礦物學則被稱為「金石學」，不明就裡的人或許

1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載《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6頁。



會以為，這兩門功課探討的仍是輿地和鐘鼎碑版這些古老的學問。<sup>1</sup>

魯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礦產，富有既如是。故帝軒轅氏，始採銅於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鑄金銀鉛鐵。逮周而礦制成……

當然，那時他還叫周樹人，那本書也不是小說集或雜文集，而是《中國礦產志》，但其流行程度並不亞於他的那些橫眉冷對、嬉笑怒罵的作品集。

《中國礦產志》是魯迅和他的同學顧琅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學部定為國民必讀書。他們期望國人重視並了解自己國家豐富的礦藏，不要總是依賴外國人去研究和轉述；他們更希望未來的中國能自主開礦，發展實業，尋求富強之道。

不過，兩人最終選擇了不同的人生。

留學回國後，顧琅輾轉於教育、實業和政治領域，但並未放棄田野考察，他後來走訪了漢陽、大冶、萍鄉、六河溝、臨城、井陘、開灤、中興、本溪湖、撫順等地，在 1916 年出版了《中國十大礦廠調查記》，書名由張謇題寫。

魯迅選擇了「躲進小樓成一統」。發表《狂人日記》時，他已經三十七歲。人們記住了三十七歲以後的魯迅，卻淡忘了那個曾經企盼尋求礦藏的少年。

由於那段癡迷礦藏的經歷，魯迅一直對困守書齋的所謂「國學家」頗為不屑。1922 年 11 月，他在《晨報副鐫》上撰文嘲諷道：「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莎士比

---

1 魯迅：《瑣記》，載《魯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05—307 頁。

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裡，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書來了。」<sup>1</sup>字裡行間皆是悲愴的冷嘲，哀其不幸，更怒其不爭。

魯迅的評判，其實不算苛責。自 19 世紀後半葉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以其七次遠征為海外漢學家、探險家踏勘中國揭開序幕，這片遠東的土地就因為極其豐富的自然、歷史與文化資源，吸引着沙畹 (Édouard Émmmanuel Chavannes)、奧勃魯契夫 (B.A.Обручев)、斯文·赫定 (Sven Anders Hedin)、桑志華 (Emile Licent)、謝閣蘭 (Victor Segalen)、斯坦因 (Marc Stein)、伯希和 (Paul Eugène Pelliot)、柏石曼 (Ernst Boerschmann)、伊東忠太、鳥居龍藏、大谷光瑞、關野貞、大村西崖、常盤大定等海外學人紛至沓來，探索地理、礦藏、生物、建築、文物，他們的足跡縱橫南北。

當伯希和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他在中國搜羅的古籍，尤其是敦煌遺書時，官員和學人無不扼腕歎息。羅振玉百感交集，感歎這是「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兩江總督端方更是早早地認定這是「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他們深感事態嚴重。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願意像海外學人那樣，親自動身尋訪一番。於是，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而尷尬的局面：來自海外的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在中國各地奔波，探訪藏匿在深山荒野間的礦藏、古跡、墓葬、洞窟……不斷地調查、攝影、發掘、整理、分析，而中國學者卻有意無意地對這些珍貴的遺跡視若無睹，或忙於欺世盜名，或甘願囿於書齋。一面是海外學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調查，卻又因中國之大，夙

---

1 魯迅：《不懂的音譯》，載《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419 頁。

願難成，只能感歎「大業的完成，恐不是吾輩人能夠等到的」<sup>1</sup>，凡事盡力而為；一面卻是中國學人始終無動於衷，沉溺於「『安樂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時代」<sup>2</sup>。

不過，當魯迅宣泄着滿腹牢騷時，一個充滿轉折意義的時代其實已經來臨，那時，年輕一代中國學人正躍躍欲試。他們大多在海外接受過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試圖重新發現古老中國的真相，重估文明的價值。他們不憚走向荒野，甚至樂在其中。在這波浪潮中，地質學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建築學家前赴後繼，終於在二三十年間造就風氣，蔚為大觀。

他們是各自領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書齋、走向曠野的第一代中國人。這本書希望重述的，正是他們的探索以及他們開創的新紀元。

## 前所未有的代代人

1913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創立地質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由丁文江主持，<sup>3</sup>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為代表的中國地質界先驅，就與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步達生（Davidson Black）、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等海外學者鼎力合作，一面努力培養專業人才，一面堅持不懈地進行田野考察，調查礦藏，勘探石油和煤礦，挖掘恐龍骨架和各

---

1 參見伊東忠太《中國建築史》，廖伊莊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7年。

2 李濟：《安陽》，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頁。

3 1913年9月8日的《政府公報》。轉引自宋廣波《丁文江與中國地質事業初創》，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5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種古脊椎動物化石，<sup>1</sup>發掘史前文明遺址……無論是在地質學、地震學、土壤學，還是古生物學、人類學等領域，都堪稱成就卓著。

1936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十五次發掘殷墟，主持者從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變成了更年輕的石璋如、劉燿、王湘等考古學人。大批甲骨和各種文物陸續出土，殷商時代得到證實，中華文明信史被向前推進了數百年。根據考古發掘，史語所的學人們陸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架構，諸如董作賓的「貞人說」、梁思永的「三疊層」、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等，皆極富開創意義，影響深遠。到1937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演講中盛讚史語所的考古發掘：

這是近年來全亞洲最重大的考古發掘。中國學者一下子獲得了耶穌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國歷史的大量可靠材料。<sup>2</sup>

其實，不獨考古組，史語所語言組的成就也不遑多讓。趙元任等人歷時十年，走訪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統地進行方言實地調查，初步勾勒了中國語言變遷的軌跡，而這些尋訪與研究的意義，正如傅斯年所總結的那樣：「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sup>3</sup>

加入史語所之前，李濟和趙元任皆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並在

---

1 這些恐龍化石大多是由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代理團長袁復禮主持發掘的，而魯迅很關注考察團的動向，曾出面向中方團長徐炳昶約稿，徐炳昶後來這樣寫道：「東歸以後，東方雜誌的編輯曾由我的朋友魯迅先生轉請我將本團二十個月的經過及工作大略寫出來……。」

2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第77頁。

3 「史語所」籌備處：《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商務印書館（廣州），1928年，第3頁。

各自領域發起過具有首創意義的田野考察——西陰村的考古發掘和吳語方言調查。清華國學研究院存世雖然只有四年<sup>1</sup>，卻網羅了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兩代名師，不僅為未來中國學界樹立了典範，亦可被視作史語所的「前傳」：陳寅恪、趙元任、李濟都是史語所的主事人，而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雖然沒有參與田野考察，但以各自的遠見卓識和影響力，為學人走向荒野掃清了障礙，更奠定下思想根基，其中，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影響尤為深遠。

地質調查所和史語所考古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國營造學社追索的則是地上的古跡。魯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擺着一幅從山本照相館購買的佛像照片，<sup>2</sup>據說，他把這尊河北正定隆興寺的佛像譽為「東方美神」，儘管他畢生都沒見過它的真身。近代中國學人中，最早見到這尊佛像的，或許是中國營造學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1932年，梁思成一行就冒着戰火，對隆興寺做了詳細的調查、測繪和研究。他認為，這尊塑像雖然遭到後世篡改，但「顯然是宋代原塑」。當然，他關注的不只是造像，更是建築風貌，並盛讚隆興寺的牟尼殿為「藝臻極品」。<sup>3</sup>

魯迅去世時（1936年），中國營造學社創建只有五年，卻已經考察了上百個縣市的兩千餘處古建築，其中的佼佼者，如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西大寺的三大士殿、佛宮寺的釋迦塔、華嚴寺的薄伽教藏，

---

1 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當時亦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後出於各種原因，在1929年停辦。

2 參見1923年7月3日的魯迅日記。「三日，曇。休假。寄三弟信。與二弟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

3 梁思成：《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載《梁思成全集》（第二卷），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9、12頁。

以及善化寺、廣勝寺等遼金以降的古建築經典，都是通過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人的考察報告昭示於國人的。這些大地上的遺構，為破解北宋「天書」《營造法式》提供了大量直觀的證據。與此同時，一部中國建築史也在梁思成心中氤氳成形。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北伐」到「中原大戰」，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國家不斷裂變，時代疾速轉捩，總統和內閣總理走馬燈般更替，登場謝幕，兒戲一般。但在這亂局的夾縫裡，以上述機構為代表的學人共同體，被愛國熱情激勵，默默耕耘，不懈奔走，戮力與共，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無數個第一：

中國人獨立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西陰村遺址發掘（李濟、袁復禮主持）；

第一份礦產資源調查和田野考察報告——《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物報告書》（丁文江）；

第一本地質學講義——《地質學講義》（翁文灝）；

第一張着色全國地質圖——《中國地質約測圖》（翁文灝）；

第一幅地震區域分佈圖——《中國地震分佈圖》（翁文灝）；

第一部石油調查報告——《甘肅玉門石油報告》（謝家榮）；

第一部石油研究專著——《石油》（謝家榮）；

第一部古脊椎動物學專著——《中國北方之嚙齒類化石》（楊鍾健）；

第一部恐龍研究專著——《許氏祿豐龍》（楊鍾健）；

第一篇古建築調查報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頒佈的文物法規——《古物保存法》；

……

他們發現了「北京人」頭骨、「山頂洞人」頭骨、龍山文化黑陶，還有海量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遼、金、元、明、清建築，提出了「燕山運動」「三門系」「三疊層」「真人說」「夷夏東西說」等理論。中國第一座地震台（鷲峰地震台）、第一個油田（玉門油田）、第一條獨立發掘並裝架的恐龍化石（許氏祿豐龍），同樣由他們全力促成。

他們大多誦讀「四書五經」長大，隨後到海外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崇尚科學精神。他們中有中國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翁文灝）、人類學博士（李濟）、第一位考古學碩士（梁思永）、最早的商業管理碩士（曹雲祥），還有「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中國科學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中國恐龍之父」（楊鍾健）……

他們是荒野上的大師，新學術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當然，他們也是第一代世界主義者，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

即便橫眉冷對如魯迅，雖不時會在日記、書信或文章中對他們揶揄一二，比如他認為史語所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精義少而廢話多」；<sup>1</sup>說梁啟超工資太高，而且「西學不大貫」，要配上李四光才能「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sup>2</sup>嘲諷丁文江陪着胡適去「覲見」蔣介石——「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

1 魯迅：《致台靜農》（1932年6月18日），載《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11—312頁。

2 魯迅：《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載《魯迅全集》（第三卷），第201頁。

一下子相好」<sup>1</sup>……不過，毋庸置疑，魯迅未竟的夢，的確已在他們腳下逐漸變成現實。<sup>2</sup>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民國時期注重田野考察的當然不止這四家機構。事實上，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魁閣」等機構同樣雲集了一批不憚走出書齋的學人，他們致力於動植物、礦產、考古發掘、民族學等領域的調查與研究，並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本書決定聚焦於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語所和中國營造學社，因為它們既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間又有千絲萬縷的關聯，形成了相對穩固的學術共同體；它們的發展歷程也足以折射出從 191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不同階段，中國學界走向田野的渴望與困惑、構想與曲折、困境與探求。正因他們的努力，一個大發現的時代終於在近代中國的土地上顯露崢嶸。

## 走出書齋，走向曠野

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讀書人走出書齋的先例。徐霞客和宋應星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正史記載中，他們注定只能淪為邊緣角色。

1912 年，當雲南高等學堂監督葉浩吾向丁文江提起《徐霞客遊記》時，從歐洲學習地質學歸來的丁文江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對這個明代的同鄉一無所知。穿越了半個中國到了上海，他才終於買到一本《徐霞客遊記》，而他真正對徐霞客產生精神認同，還要再等兩年。兩年後，他到雲南考察地質，在極度疲倦中閱讀了這本兩個多世紀前的遊

---

1 魯迅：《知難行難》，載《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47 頁。

2 相形之下，魯迅只對王國維比較客氣，他認為：「要談國學，他（王國維）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參見魯迅《不懂的音譯》。



記，他發現，自己在考察路上的見聞，與徐霞客兩百多年前的記錄竟能逐一吻合，不勝感慨：「始驚歎先生精力之富，觀察之精，記載之詳且實。」<sup>1</sup>

至此，他才真正對徐霞客心生敬意，更滿懷好奇。然而，這樣一個傳奇人物的人生歷程居然模糊不清，著作也早已支離破碎，大量散佚。於是，丁文江決定為徐霞客正名，整理徐霞客的遊記和年譜，繪製其周遊天下的路線圖。這項工作，幾乎集結了三代人的力量，他的前輩梁啟超、張元濟、羅振玉等人慷慨地為他提供了典籍資料，而他的後輩朱庭祐、葉良輔、譚錫疇、謝家榮、王竹泉等人則把在各地繪製的地圖交給他，點點滴滴拼合出徐霞客走過的路。

宋應星是另一個引發丁文江強烈共鳴的人。1914年，他在昆明圖書館收藏的《雲南通志》中，讀到一段關於煉銅的描述，深為折服。這段引文摘自《天工開物》——又一個陌生的名字。更讓他震驚的是，這部明代的奇書在偌大的中國竟然一本都找不到。經過章鴻釗提示，他才知道，大洋彼岸的日本帝國圖書館，反倒收藏着這部古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於是，丁文江又歷時十三年，尋找傳世的版本，並努力還原宋應星兄弟的故事。

徐霞客和宋應星終於不再是深埋於歷史深處的無名氏，反而成為許多年輕學人的精神偶像。身處國家危亡的年代，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丁文江也習慣拿中國的先賢與西方的比較，進而論證華文明曾有過的偉大創舉。他熱誠地宣稱徐霞客的旅程是「文藝復興精神的體現」，稱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其精神與近世科學方法相暗合」。

1 丁文江：《重印徐霞客遊記及新著年譜序》，載徐弘祖撰，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0頁。

他認為徐霞客的「『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他評價《天工開物》的創造性價值舉世無雙：「三百年前言農工業書如此其詳且備者，舉世界無之，蓋亦絕作也。」他試圖論證，科學的精神與探索在中國由來已久，遠超西方，只是暫時失傳湮沒罷了。

丁文江以現代徐霞客自期，而他的「萬里遐征」，更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見」，記「徐霞客所不曾記載」。<sup>1</sup> 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頂，調查不要代步」，一生身體力行。無獨有偶，這幾家學術機構的核心人物都做過類似的表態。丁文江的同事與繼任者翁文灝呼籲學人「擔斧入山，劈荊棘斬榛莽」，<sup>2</sup> 甚至還提出，「如果一年沒有上山，便不配稱地質學者」<sup>3</sup>；史語所創始人傅斯年要求書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sup>4</sup>；從清華國學研究院加入史語所的李濟要「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sup>5</sup>；趙元任興致勃勃地表示，「用表格用錄音器作系統化的調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處學說各種話當然又是一回事」<sup>6</sup>；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則強調，「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各種動詞，擲地有聲，而歸根結底，都是呼籲學人走出書齋，走向曠野。

---

1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29頁。

2 章鴻釗、翁文灝：《地質研究所師弟修業記》，京華印書局，1916年。

3 翁文灝：《回頭看與向前看》，載李學通編選《科學與工業化》，中華書局，2009年，第18頁。

4 「史語所」籌備處：《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5 李濟：《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楊朗選編《李濟文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7頁。

6 趙元任：《我的語言自傳》，載趙元任著，吳宗濟、趙新那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655頁。

許多年後，胡適給亡故多年的老友丁文江作傳（《丁文江的傳記》，1956年），依然忍不住感歎：「這樣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現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

這不只是致以丁文江個人的敬意，其實也是丁文江這代學人的精神寫照。但這代人注定飽嘗艱辛，甚至前途莫測。如果地質調查所沒能勘探出礦藏，沒有發掘出「北京人」頭骨或恐龍化石，如果史語所沒能在殷墟發掘出海量的有字甲骨和各種文物，沒有找到殷商故都的基址，如果中國營造學社沒有發現大量古建築經典……很難說這一代學人不會繼續「淪為」又一個徐霞客或者宋應星，最後從歷史中悄然退場。

所幸，他們與一個大發現的時代相互成就。身處亂世，他們遭遇離亂動盪，可是，他們無疑又生逢其時。

## 絕境裡求生，陳見中突圍

丁文江迫切地希望為徐霞客和宋應星正名，其實也未嘗不是為了給他這一代中國學人正名。他們面對着更加複雜的社會環境，置身於動盪的大時代，萬事不由己，只有竭力而為。

中國的讀書人從來都對體力勞動心存鄙夷，而無論地質調查、考古發掘還是古建築考察，都需要頻繁外出，風餐露宿。儘管從洋務運動以來，實業救國已成共識，地質調查因此有了發展空間，許多人也開始認可考古發掘和古建築調查，相信它們有助於了解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甚至賦予其愛國意義，然而，社會觀念如故，田野考察依然面對巨大阻力。

思想鴻蒙未開，民眾對考古發掘更是誤解重重。人們天然地相信，考古發掘就是搜羅寶物。李濟、袁復禮離開西陰村後，車站檢查人員如臨大敵，懷疑他們盜取了珍貴的文物。不料，一箱一箱查驗，居然

全都是些碎陶片，這讓檢查員無比困惑，為甚麼要千里迢迢地把幾十箱碎陶片運回北京？<sup>1</sup> 抗戰期間，史語所遷到李莊，當地的鄉紳與百姓一度以為，這些學者是以吃人為生的——抗戰千里流亡，隨身攜帶的一定是最貴重的東西，可他們的行李中卻塞滿了人類的遺骸。石璋如到豳縣（今陝西彬縣）考察，一邊使用指南針，一邊繪圖，以致當地陪同的人堅信他是風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幫忙看看風水，無論石璋如怎樣解釋都無濟於事。<sup>2</sup> 地質調查所歷時多年終於出版了《中國分省新圖》，丁文江卻在序言中繼續苦口婆心地呼籲：「我們只希望以後同行的諸君，少講些龍脈，少畫些筆架，使得中國青年漸漸地了解地形是怎樣一回事。」<sup>3</sup> 楊鍾健在雲南發掘出恐龍骨架，到重慶北碚舉辦展覽，竟然有人畢恭畢敬地拜倒在恐龍骨架前，虔誠地進香。他們不知道此龍非彼龍，只是敬香祈福的習慣由來已久，條件反射般深入骨髓。這樣的傳統太過漫長，以致梁思成尋訪雲岡石窟時忍不住感歎，十幾個世紀以來，民眾忙着焚香膜拜，卻對精美絕倫的造像熟視無睹，「在這講究金石考古學術的中國裡，（雲岡石窟真正的價值）卻並未有注意及之」。<sup>4</sup> 千年以降，中國大地上的無數瑰寶正是這樣被有意無意地遺忘殆盡。

他們發現，在中國進行田野考察，最大的對手，其實是金石學傳統，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中國營造學社外出考察古建築，當地嚮導聽

---

1 李濟：《〈殷墟陶器研究報告〉序》，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楊朗選編《李濟文存》，第188頁。

2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

3 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中國分省新圖》，申報館，1933年。

4 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載《梁思成全集》（第二卷），第177頁。

說梁思成等人對古物感興趣，常常會自作主張帶他們去看碑刻，他們覺得，碑刻才是藝術，而建築不過是工匠的手藝，難登大雅之堂。起初，考古學被許多人認為只是金石學的一個別名而已，<sup>1</sup>而當中國學人開始獨立進行考古發掘，即便是馬衡、董作賓這些從傳統金石學框架中努力轉型的一流學人，也曾對考古發掘存在誤會。馬衡相信，通過考古發掘，可以挖出「地下二十四史」。這個天真的設想顯然不可能實現。董作賓主持殷墟第一次發掘，因過度關注甲骨，挖到人類遺骸，頓感冒犯了先人，匆忙把它們重新掩埋起來，直到後來與李濟相遇，才知道人類遺骸同樣蘊含着豐富的考古價值。到 1930 年代，考古發掘雖已碩果累累，然而，當夏鼐參加公費留學考試被考古專業錄取時，他頓感前途渺茫，哀歎自己「簡直是爬到古塔頂上去弄古董」。<sup>2</sup>夏鼐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後又師從傅斯年和李濟，連他都對考古心存偏見，旁人更可想而知。

政府對地質發掘和考古發掘的態度更為複雜。當地質學家致力於勘探煤礦、金屬、石油，為實業助力時，政府自然大力倡導、支持，而一旦科學家被地下的出土物吸引，開始發掘文物、古生物化石乃至古人類遺骸，政客的態度就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就想當然地以為，所有考古發掘都是盜墓，為此，他義正詞嚴地致電總統、行政院、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要求立即停止考古發掘，還威脅說，倘若在古代，做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是要被凌遲處死的。李濟當時就預感到，「從此考古工作恐將永無太平之日」，這種「新舊史學觀

1 李濟：《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載張光直主編《李濟文集》（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

2 夏鼐：《夏鼐日記》（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65頁。

點的衝突」很容易就會被政治化。不出他所料，縱然蔡元培率領學者嚴詞反駁，行政院還是下令嚴禁發掘古墓，以致有的地區的考古發掘被迫延期。

地方與中央的博弈，同樣影響着田野考察。李濟到西陰村發掘，還帶着兩任前內閣總理和梁啟超寫給時任山西省省長閻錫山的介紹信，「山西王」卻一直避而不見，倘若不是山西省內務署的負責人被李濟的誠意打動，這次考古發掘很可能就此擱淺。發掘殷墟更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河南當地政府懷疑史語所盜取寶物，多次以各種形式粗暴干涉，而無論蔣介石的命令，還是《古物保存法》的頒佈，都無力影響河南省高層與基層的決策。只有權力和武力才能主宰一切，等到蔣介石贏得「中原大戰」，將河南納入勢力範圍，一切自然迎刃而解。為了贏得地方人士的信任，梁思成不得不學着用「老派的上層社會方式與軍官和地方官員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時，他一面保持着「低調、禮貌而恭敬」的態度，一面又掏出印滿各種頭銜的名片，在言談間若無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當地人才終於對他刮目相看，願意提供支持和幫助。<sup>1</sup>

困擾田野考察的，不止社會觀念和政治壓力，資金問題同樣棘手、嚴峻。

傅斯年努力湊齊了一千元，殷墟發掘才終於正式啟動，然而，第三次發掘結束後又陷入困境，弗利爾藝術館決定與史語所中止合作，

---

1 參見費正清《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熊文霞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此外，林洙還提及：「每次外出調研，社長朱啟鈞均事先通過社員中有關的黨政頭面人物，向當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處，各縣縣長、教育局局長均親自接待，並派員嚮導，必要時還派保安人員護送。」參見林洙《叩開魯班的大門——中國營造學社史略》，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5年，第21頁。

所幸，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及時施以援手。<sup>1</sup>殷墟第十一次發掘成果卓著，但預算遠超過撥款，值得慶幸的是，中央研究院第二任總幹事是丁文江，他深知田野考察的意義，於是另闢蹊徑，邀請國立中央博物院參與投資，約定先由史語所研究出土文物，此後再把它們送到博物院珍藏，這才妥善解決了資金問題。<sup>2</sup>中國營造學社的前身營造學會，幾乎讓創始人朱啟鈐耗盡家財，也是由於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又有中英庚款董事會襄助，中國營造學社才得以建立並運轉十多年。周口店的發掘則依賴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資金，可是，當出土成果越來越少，資金也就日漸匱乏。1936年，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岌岌可危，隨時可能會關閉，是賈蘭坡發現的三個「北京人」頭骨拯救了這家學術機構。

抗戰爆發後，情況日益惡化。在昆明，董作賓和胡厚宣準備拓印殷墟 YH127 坑出土的有字甲骨，卻找不到足夠的宣紙。<sup>3</sup>陳寅恪寫完《元白詩箋證稿》，也沒有合適的稿紙謄抄，只好給史語所的同事寫信求助。為了維繫中國營造學社的運轉，梁思成一次次前往重慶，向各個政府部門求援——他的前半生衣食無憂，亦無心仕途，後半生卻不得不放下自尊，與官僚們周旋，四處化緣。謝家榮等人進行地質調查時，則下定了決心，「必要時一切事可由我們自己來做，剩下的錢，我們要留作野外調查之用，萬一公家一時不給我們款子，那我們只有吃飯不拿薪，我們學地質的應有這種苦幹精神」。

這二三十年間，中國學人無疑是在絕境裡求生，於陳見中突圍，

---

1 李濟：《安陽》，第 78 頁。

2 同上書，第 89—90 頁。

3 同上書，第 131 頁。